

第五卷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陳雲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五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本书编委会约请专家及部分作家、记者，选择自“五·四”运动至今的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将其业绩撰写成传，汇集出版。选择的标准是：在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评价客观公正，很多资料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它系统地介绍了各教育家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观点，可供现代史学工作者、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亦可供师范院校师生作课外参考书用。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生动形象，具有可读性。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得到历史知识，学习教育家们的动人事迹和治学、成才的经验。

二、本书将分辑出版，对港、台教育家除已收录者外，也留有适当名额，并陆续进行汇集。全书各教育家传收入的次序按撰稿及编辑完毕的时间先后排列；同一辑中则按各教育家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列。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全体编写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周谷城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很多教育界前辈及其亲友，全国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教，谨在此一并致谢。

四、本书中有二十一位教育家的传记，曾经以《科学与人》丛书的名义结集出版，本社此次出版时，已将其内容作了修订和调整，另行分辑，特此附加说明。

五、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有限，且限于其他条计，因此难免不有缺点及遗漏之处，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五卷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曾卓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2次印刷

字数：320,000 印张：14 印数：1—1,830

ISBN 7—5355—1261—X/G·261

统一书号：7284·954 定价：4.35 元

序

周谷城

自1919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

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

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多位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均将考虑收入本书。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目 录

1	胡元倓	曹典谟
37	朱剑凡	肖 本
54	胡庶华	郭仁成
90	梅贻琦	黄廷复
148	李 达	王炯华
212	陈 时	宋汉炎
、 246	冯友兰	唐 旬
295	周谷城	张志哲
、 326	戴伯韬	李隆庚
371	华罗庚	张志善
、 415	钱伟长	金 磊

DB.80/1

曹典谟

胡元倓



站在桔子洲头远远望去，古城长沙，湘江东岸，泰安里，绿荫丛中有一所占地4万平方米的著名学府，那高大堂皇的建筑物——“乐诚堂”（教学大楼），在30年代特别令人翘首企望，宛若鹤立鸡群。它，是三湘四水成千上万青少年代代相传的摇篮，是湖南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丰碑。

这就是令人萦怀和向往的明德中学。

它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盛誉。天津大公报主笔胡政之于1934年4月28日撰文盛赞：“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勤劳，如泥瓦工人也。”明德比南开长一岁，迄今已历84个春秋了。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就是胡元倓。他从1903年起，就以“明德”的名义办过综合大学、中学、小学、师范、专科、预科，但以中学为主，也最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解放以前，就培养了学生近万名，其中各类毕业生6375人。任弼时、周小舟（怀求）、周谷城、

陈果夫、黄少谷、陈嘉佑、张平子、欧阳予倩、胡庶华、刘永济、辛树帜、曾约农、蒋廷黻、钱无咎、杨宙康、刘公武、傅任敢、刘佛年、宁调元、任邦柱、吴鉴光、邬干于、彭国钧、方克刚、萧元定、劳启祥、萧敏颂、薛君度、龚育之、李传信、刘观恩、潘基镛、沈立人、魏泽馨……这些党政军要人、教科文名流，都是明德的学生。饮水思源，怎能忘记老校长胡元倬呢？

—

胡元倬，字子靖，号耐齋，1872年9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八月初七）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胡湘（筠帆）曾在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任知县。父亲同寿、伯父锡燕跟随前往南海，师承广东著名学者陈澧，学习诗经、通鉴，著有《诗古音释》、《通鉴校刊注》。长兄元仪是著名学者郭嵩焘的弟子，研究诗经、荀子，亦有著述，由经学家王先谦编入其主编的《皇清经解续编》和《荀子集解》中。六兄元玉受教于元仪，又是著名学者湘绮老人王闿运的女婿，因而学得更好，研究春秋，其著作也被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续编》。

元倬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胡九先生”。他的学生则尊称为“九师”。他有此家学渊源，且可随时向王闿运质疑解惑，所以他的学术造诣也很深。《湘绮楼日记》十月二十八日载：“胡子靖来，夕食去。”（1895年）又载：“三月九日胡子靖来，云来阅府县卷。”（1900年）由此可见，他俩过从甚密，而元倬受益非浅。清末，尤其是戊戌前后，湖南士大夫好谈天下事，且往往聚会纵论，元倬受其影响亦大。他学有所成，1897年，26岁，“选丁酉科拔贡”。

1902年春，乍暖还寒的一天，刚迈而立之年的胡元倬奉湘抚

俞廉三之命，乘海轮东渡日本。抬望眼，甲午之战烽火刚灭，东海岸弹痕犹存；八国联军狼烟又起，圆明园余烬未息。耳听得，“门户开放”之嚣声不绝，“东亚病夫”的蔑称难堪。回首往事，清廷腐败，丧权辱国条约叠起；康梁亡命，谭嗣同等惨遭屠杀。仰天长啸：我堂堂中华，何以立国？莘莘学子，何以救国？于是，“立宪共和”、“革命救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种种呼声高涨。胡元倬便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常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便不能打碎那个腐败的国家机器，一切改革无从谈起。但革命只能打乱，而不能再做，再做的任务要由教育来承担，教育才能培养建国各方面的人才。只有通过这千千万万人才的努力，才有可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因此，他毅然放弃举子之业，到日本去学习师范教育，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在留学时，他首先看到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教育的普及；又很羡慕福泽谕吉创办的以财政经济著名的庆应义塾（后改名庆应大学），储才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胡元倬便矢志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

与胡元倬同去日本留学的，有陈润霖、余浩庆、丁文江等十余人。他们是湖南第一批出国留学生。

1902年冬，胡元倬学成归国，马上行动以实践自己的理想。与其表兄攸县龙璋（砚仙，时任江苏泰兴知县）、龙绂瑞兄弟商量，并承绂瑞的父亲龙湛霖（芝生，前清刑部侍郎）赞助，捐款两千元，作为开办费，并利用龙、左两家的亲谊关系，租赁城北左文襄公祠（即现在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房屋为校舍，首创明德学校于长沙，1903年3月29日正式成立（1907年迁至泰安里）。

湖南有私立中学，实自明德开始。在此以前，虽有梁启超、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但为时很短；戊戌政变后，便停办了。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曾对明德的创立作了很高的评价：“时务虽倒，而明德继兴。”

留日学生陈润霖等毕业回湘后，他们也先后陆续办起了一所又一所公立、私立学校。

明德学堂开办之初，由龙湛霖任总理（董事长），胡元倓任监督（辛亥革命后改称校长），龙绂瑞任副监督，招中学甲、乙两班，共80人。

明德的牌子亮出来了，学堂的架子搭起来了。但创业难，阻力大，困难多。而胡元倓呢？坚决迎难而上，在夹缝中奋斗。

首先，碰到的是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破坏。那个时候，慈禧太后还没有死，科举制度也没有废，而胡元倓竟敢标新立异办新学堂，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湖南，还有一种人，即以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中兴功臣”桂冠的文官武将们，他们辞官解甲回湘后，形成了一股特殊势力，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绅权之大，几能左右一切。他们拥护湘绅领袖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人，强烈反对开办新学堂。或公开谩骂，或暗中破坏，无所不用其极。王先谦就曾拉拢和唆使明德教员刘佐楫搞破坏。刘佐楫本来是胡元倓在东京弘文师范的同学，并曾出钱二百串，赞助明德开办。这时，他却利用地理教员周震麟和国文教员陆鸿逵在学生文卷上批语措词激烈，唆使学生单启鸿通过其兄启鹏，向王先谦密报，王又向巡抚赵尔巽密报，说明德师生倡言革命，蓄意造反。结果，周震麟被迫离开明德，学堂陷于困境。胡元倓倾向维新革命，看到形势不好，便请龙氏兄弟从中斡旋，和官方取得联系。有一天，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来校视察，学生们正在自习，教室里鸦雀无声。赵尔巽情不自禁，大加褒奖，说胡元倓办学有方，教训的工夫作得好，非旧式私塾所

能及。并且月给津贴千两。还有兵备处总办俞明颐、长善学务处总办俞诰庆等，都是留日同学，胡元倬也同他们有来往，他们也给胡元倬以支持。为了维护明德学堂不被搞垮，胡元倬就这样利用官绅权势，与顽固派作斗争。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与龙湛霖、谭延闿商量，另租西园龙宅西侧房屋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经正与明德，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明德万一被搞垮，还可以在经正继续上课。辛亥革命后，两校合并。

再者，聘教职员难。从上述可知，当时的明德中学，是湖南新旧势力交锋的场所。胡元倬延聘人才采取的策略是兼容并蓄，两派应付。他邀请黄兴、张继、周震麟、苏玄瑛（曼殊）、陆鸿逵、李步青、王正廷、秦效鲁、翁又拱等革命派来校任教，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宋教仁、吴禄祜、李书城等革命志士虽不在明德任教，却常在明德活动。1903年6月黄兴应聘到校，带来了陈天华、邹容所著的《猛回头》、《醒世钟》、《革命军》等书，在明德翻印，分发给学生。胡元倬尽力多方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后又聘请茶陵翰林谭延闿继龙湛霖为明德总理，以获取资助；湖南立宪派的重要人物，如粟戡时、廖名缙、曹典球等，也都先后担任过明德的教职员。聘教员，摆在胡元倬面前还有一个难题，当时要想请到合格的教员真如凤毛麟角，特别是数理化和外语教员奇缺，而他又非常讲究“教员阵容整齐”，素质强，水平高。他常说：

“学校里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进步于无形，而职员可以腾出手来从其他方面做增进学生品质和健康的事业，才可以使学生进德修业，三育并进。相反，如果教员程度不够，阵容不齐，学生无尊师之心，不能受教师之益，甚至引起风潮，职员将会忙于边压边哄，补苴罅漏，疲于奔命，无以自圆其说，弄得职员也因而失掉信仰，转成众矢之的，一切问题常从此起。”

为了聘请优秀教师，使明德“教员阵容整齐”，胡元倓不惜远上沪杭，东渡日本，重金礼聘，甚至肯下身段，屈膝以求。到上海，请黄兴教体育。赴杭州，聘华龙教英文。自日本请来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江正直。长跪不起恳求陈介，苦留一年，更在教育界传为佳话。陈介在《明德话旧》一文中回忆道：

“余识胡先生，远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秋。时先生由湘政府派在日本东京，习速成师范，已将毕业。余由浙省派往，习普通科，年甫十八，与同在日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为中国学生所设之弘文学院，以隶湘籍，得与先生及黄廔坞（名軫，后改名兴，字克强）、杨哲子（度）诸先生时相过从。先生未久即毕业返国……甲辰春暮，余毕业普通科，因距考大学预科尚有数月，乃乞假回国省亲，绕道至湘扫墓，道出长沙，得遇先生及黄先生。值其正至日本聘来理化与博物教员二人，器械先至，拟开办师范班，学生（胡春藻——庶华、彭全方——国钧两先生均是该班学生）亦已招妥，只待能聘一通日语之助教，即可开学。两先生以余适至，坚留为助，并允暑假后，聘留日之李侗君（恺）先生继任，余勉允之。适夏间，余返湘乡故里完婚，李先生以恐废学，未果来。某日两先生访余于所寓龙宅花厅，苦留一年，余以秋间须返日，不之允。先生于座众前，向余长跪，非允不起，谓为向袁海观（树勋，时任上海道）先生募捐，曾一屈膝，今为请教员再为之。余感其诚，欣然承诺，但以年后能由省费派赴西洋，或仍返日本继续求学为条件。次日，先生复见介，其时，提学使张小圃（鹤龄）先生为证，余以是继续一年。湘教育界因先生之跪，一时传为佳话。……

“是年秋季，胡先生假周氏花园办一明德小学，分甲乙两班，教员皆由中学分任，而以余为主任。甲班中有黄先生长子一欧、

陈果夫(时名祖焘)、阎鸿飞(幼甫)诸君,是校在当时长沙颇有名……

“余一年期满,胡先生与湘当局均践约,以湘官费资送日本,四年后转学德国,至民元始返国从政。”

胡元倬在多方延聘人才的同时,还很重视教学设备的完善。他亲自到上海买回许多理化仪器、生物标本,有一些在国内没有卖的,他就远下南洋,东渡日本,在筹款之后,从海外购置回来。各种新书,及时买回,因而藏书甚丰。生物实验,两个学生共用一架显微镜,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至今明德中学仍保存了当年购置的仪器。

明德为什么一开创就办中学,1926年以后长期专办中学呢?这是因为胡元倬主张大力培养中等社会的人才,他曾对黄兴说:

“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

但是中学办起来之后,胡元倬发现学生来源不足。于是在创办中学四个月后,7月接着招速成师范一班,共118人,超过中学两班的人数,于第二年4月毕业。此后,又在谭延闿的家乡茶陵、龙湛霖的家乡攸县开办速成师范班。这样小学教师培养出来了,1904年就附设高等小学,四年后又增设初等小学。黄一欧、陈果夫、曾约农就是这个时期的小学毕业生。同时在高小部附设有中学补习科和中学预科,以便大龄青年能够考上中学。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并解决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同时又增设语文、商业等专修科。胡元倬看到当年留学日本的风气正盛,始开日语,屈膝苦留陈介执教;他又看到英国称霸海上,继开英文,用谭延闿赞助的一千元,亲赴杭州重金礼聘华龙授课。由此可见,胡元倬很重视外语教学。不仅如此,胡元倬还看到西洋“商战”力量强大,极欲与之抗衡,于是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冬，始办高等商业科，复在南京创办银行专科，并与大清银行商定，学生毕业后全部到该行工作。后又正式改为南京高等商业学堂，在上海、汉口设分校，长沙本校也招收银行专科学生，增设银行保险科等。

1913年，胡元倬又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任校长。一年后，当时的教育部视学报告称：北京四所私立大学中，明德办得最优，“专门部商科，不用讲义，由教授口授，学生笔记，均能纯熟，尤为特色。”特令褒奖。1915年春，教育部举办全国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审定结果，明德大学得77.8分，荣获“冠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胡元倬立即停办明德大学，以示抗议。1919年迁至汉口。

综合起来看看，可以表述如下：

速成师范→小学→中学→专修科、高等商业学堂、明德大学。

这样就形成了明德式的独特的教育体系，加上资送全班学生留日、推荐学生服务商界、教育界；这样不仅能够把年幼无知的青少年，培养成为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而且能够成为有用人才，毕业即就业，达到了储才建国的目的。这是胡元倬教育救国论的伟大实践，他是湖南新兴教育事业的第一位开拓者。

胡元倬肩负着如此庞大的教育体系，明德又是私立，他本人只是个穷拔贡，巨额经费从何而来？这里有一位见证人，名叫陈懋涛，曾长期担任明德中学的训育主任、教务主任，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这个经费难关就靠胡元倬这里清津贴，那里求募捐，左挪右借来渡过。”

先说津贴：明德开办不到半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就月给津贴千两。过两年后，端方继为湘抚，除豁免明德借公家的一笔贷款

外，还月加津贴300两。民国成立，前清度支部腾一笔饭余金，明德分得8万元。湖南教育厅对明德的津贴一开始就是甲种，1924年以后升为特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每年津贴万元。民国政府时期，中央大学院按月补助2千元。最突出的是中俄庚子赔款拨给15万元，中英庚子赔款拨给4万元，抗战时期的教育部又月增津贴2千元。

上述津贴也不算少，特别是中华教育基金和两笔庚款，全国私立学校当中只有明德和南开得到过。但是应该指出：第一，有些津贴是从一种企业盈利和税收附加派生的。比如清末赵尔巽对明德月给千两，是从湖南铜元余利项下开支的。到1907年，湖南停止铸造铜元，这笔津贴就无形取消。又如湖南教育经费从1912年以后至抗战时期，完全依靠盐税附加；在过去内战是常事，战争一爆发，盐税就要断绝或减少，切肉连皮，附加自然要受影响。即便是和平时期，没有内战，但全省的盐税也是很有限度的，而公私立学校逐年增加，因此津贴就不能持久稳定。第二，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而湖南地当南北之冲，更是受祸最深。地方教育经费被这些割地称雄的军阀全部中途提取，还哪里有什么津贴！再说这些津贴也不是凭空发给每一个学校的，要在学校的成绩、信誉和物质建设等一定的水平之上，去钻，去争，去多方请托，才有可能分得一杯羹，否则就要向隅。这些工夫一贯是由胡元倬包干的。

其次是募捐。明德本来是靠人捐款办起来的。1935年寒假，少数远道学生留校，陈岱涛于旧历除夕组织一个学生晚会，请胡元倬谈明德掌故，他说：“我癸卯三月初开办明德学堂，由我姻丈龙芝生（湛霖）捐二千元，表兄龙研仙（璋）、黄溪（绶瑞）兄弟各投一千元作为开办费，社会上说明德姓胡，我说明德实际姓龙。不

久谭祖庵(延闾)用他老太太的钱捐一千元作购置费，又另捐一千元作聘请英文教员的薪水。”龙潭两家还捐献了许多珍本旧籍。后来推广到达官贵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广总督端方、上海道袁树勋和清宗室振贝勒等人先后捐助巨款。进一步他又向银行企业和巨商大贾劝募，得到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湖南实业等银行、哈尔滨交通船业公司、湖南淮商公所等企业的大力帮助。1922年他到南洋群岛槟榔屿和新加坡等地向爱国华侨劝捐，得款不少。他回忆学校在一段时期的困难情形说：“有一次，一期只能发给三个月薪水，职员同人见谅，自动提议起折发薪。有一次比这更糟，我只能在期末对每位教职员送一把宜兴茶壶，作为纪念。”以后在学校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得向学生家长劝捐，或趁某种宴会拿出捐簿，当场劝捐。早期的学生家长如黄锡光、谭长生，较晚的如学生欧阳平坤的家长，以及社会人士，也有乐于捐助的。自然也有些人不乐意解囊，又苦于不好拒绝，于是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了胡子靖”的话来，一时流传很广。1937年，他请春客，酒后谈天，他说：“我办明德，向人家磕过两次头，请袁树勋捐款是第一次，至于请振贝勒捐款，更有喜剧性的排场，因为‘大人好见，小人难见’已成为官场中的一种习气，我从小就生得憔悴，不象一个当官的样子，又不讲究穿着，这位亲王的门上看不起我，一连几次挡驾在门外。后来我才借人家一件貂皮马褂和蒲锦袍子穿在身上，雇一辆漂亮马车，临时又请16名呵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直奔亲王府——这样才见着他。”

津贴不可靠，募捐时有时无，而明德不能不办，不能不扩充，胡元倬的第三着棋便是借贷：或是向本地政府借，或是凭学校的抵押、校长的信用向银行借；这种借款有的还了，有的由债权人免了。有一次，他到南京找端方，想通过他向南京裕宁官钱局借